不同时代的不同抉择

——重读路遥《人生》

□刘 涛

路遥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重要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曾轰动一时，影响至今不衰。可惜路遥不能节制，不能养生、护生，“早晨从中午开始”，起居无常，消耗过度，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人生》发表于1982年，是路遥典型的作品。若想看清楚《人生》这部小说，须将它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解读，尤其须与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阅读。路遥说，有两个作家对其有巨大的影响，其一是柳青，其二是秦兆阳。在《人生》开篇之前，路遥曾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柳青的这段话作为路遥的开场白高悬于《人生》之前，可谓指南针，借此可以知道《人生》要说些什么，这段话也是理解《人生》的钥匙，由此可以打开《人生》及其背后的世界。《人生》可谓路遥为演绎柳青这段话之作，只是《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中国，《人生》则是写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时代已变，故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也随之一变。

这段话出自《创业史》第15章，柳青关于人生的话语重心长，也颇为抽象，这段话是针对《创业史》中的改霞而言。其时，改霞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她瞻前顾后，颇为犹疑，她或可报考西安的工厂，或可留在农村。前途的抉择中还掺杂了爱情的选择，改霞若留在农村，可与梁生宝在一起，若去了城市则须与梁生宝分离。柳青这段话似警告，似劝说，归根结蒂意思是人一定要做对选择，否则人生就会受到影响。所谓正确的抉择，就是识时务，就是看懂或者加入时代的大潮，亦是智慧；不正确的抉择就是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就是不智。

柳青是一个有志向的作家，《创业史》是宏大叙事，柳青试图总体上写一个村庄蛤蟆滩。蛤蟆滩是当时中国的缩影，柳青围绕着互助组问题，写了诸多路线之间的较量，写了不同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梁生宝和改霞是《创业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他公而忘私，体现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风采；改霞则是“梁生宝和郭振山矛盾的连接点和推动力”，她连接着两条路线。梁生宝看懂了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他甚至都不必抉择，就是留在农村，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之路；改霞虽欲离开农村，进城市当工人，但是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改霞时而动心，时而后悔、自责甚至反悔。改霞最终痛下决心进城当工人并离开梁生宝的原因在于她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小说写到：“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这个念头，自从5月之夜不愉快的幽会中从她脑里萌起以后，她就再用铁镊子也夹不出去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汉的好媳妇。”如此一来，改霞离开梁生宝进城当工人，原因就不是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有差距，而只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在柳青那里，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只是工业和农业的区别，在理论上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工业和农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农村，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于农村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这一年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农村以工业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而此前的农村如同孙中山所言是“一盘散沙”。在小说中，1953年的春天被描述为：“1953年的春天，庄稼人们看做亲娘的关中平原啊，又是万木争荣的时节了。……但1953年春天，人的心情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1953年春天，是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柳青的语言激情澎湃，非常类似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似乎农村自此之后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在一个亘古未有的时刻，梁生宝肯定不会离开农村去城市，农村会给其足够的发展空间，他在农村也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进城似乎都是落后与自私的表现。

《人生》较之《创业史》已极为不同，路遥接着梁生宝和改霞的抉择来写，他只是以村庄为衬托写高加林的个人抉择，他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出抉择，同时也要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做出抉择。抉择就是心之所之，个人所之的方向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向，所谓人往高处走，其时的高处已经是城市。做出什么样的关键性抉择，走了哪条路，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因此这部写抉择的小说，被冠以一个沉重的名称《人生》。高加林的最终选择是去城市，放弃农村，相应地在爱情中他选择了黄亚萍，抛弃了巧珍。高加林抉择的过程不再一波三折，不再遮遮掩掩，不再伴随着后悔或者反悔。高加林与梁生宝的抉择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变，处境已变，因此抉择亦随之不同。《人生》中的高加林的抉择好比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梁生宝不再待在农村，他进了城。20世纪5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是一体的，所以梁生宝可以以不必抉择而抉择；20世纪8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已经二分，所以何去何从就有了痛苦的抉择。

《人生》就是写了这样的抉择。1950年代，梁生宝义无反顾地留在农村，组织农村互助合作，1980年代初梁生宝为什么要走改霞的路？这就是时代的信息，其中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关键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村互助合作的终结，1953年的春天曾是划时代的时刻，但是1978年冲淡了1953年，1978年成了新的历史起点。1978年的梁生宝在农村会作何感想？新一代的梁生宝在农村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于是他们只好进城。城市和农村若在20世纪50年代仅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对立尚比较隐蔽；而在1980年代初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已经日益公开化，而且差距日益扩大。

《人生》中有一个细节写得非常好，能够传递出时代的信息。小说写到：“她显然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是的，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也不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以前只去过克南家两三次，她怎能把他记住呢？既然是这样，他高加林也就不想客气了。但他出于对老同学母亲的尊重，还是尽量语气平静地解释说：‘您不要生气，我很快就完了。这没有办法。我们在晚上进城拉粪，也是考虑到白天机关工作，不卫生；想不到你们晚上在院里乘凉哩……’旁边那几个干部都说：‘算了，算了，赶快装满拉走……’但克南他妈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加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克南他妈的进攻底气十足，高加林的反击则没有力量。底气来自哪里？来自时代精神的认可。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不被时代精神认可，因为高加林以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为根据。《人生》中的这个细节却是对革命话语的颠覆，彼时脚上有牛屎者干净，1980年代变成了脚上有牛屎者臭。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等级在1980年代公开化了。没有等级的时代，梁生宝在农村和城市都可以，但是有了等级，城市当然成为新一代梁生宝的首选，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而且义无反顾。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可以理解为《创业史》的第三部，高加林只是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而已，路遥接着柳青写农村的情况，只是《人生》写了1980年代农村的情况，而1978年前后的农村已经截然不同。

高加林对城市与农村的抉择尚伴随着对不同女性的抉择，高加林之于巧珍似乎始乱终弃，在道德上，高加林须遭到谴责，但是路遥对高加林似乎没有过多的责备，他甚至对高加林的态度比较暧昧。路遥的暧昧体现在隐含叙述者的态度中，也体现在他对各个人物的安排之中，路遥甚至故意制造高加林与农村环境之间的对立，为高加林离开农村寻找合理性和借口。在与人的谈话中，路遥也说：“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的人，在生活里并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20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加林批评一顿。”

柳青对梁生宝充满着赞美和肯定，因为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但是柳青对改霞的态度却有些暧昧，在他的解释中改霞进城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已。路遥对于高加林的态度却极为暧昧，为什么？或许路遥并未看清那个时代，他或许不知道高加林离开农村进城意味着什么，他只是看到了有人进城，于是写了下来。而且，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时期，社会主义的消极经验让知识分子尚心有余悸，大家都在观看，路遥暧昧的态度或许恰是当时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人生》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就是因为路遥写出了问题的复杂和人物的丰富，若路遥立场鲜明，他或者批判高加林背弃农村进城，或者他支持高加林进城，这都未必能见出20世纪80年代暧昧的总体心态。中国何去何从，当时大家的态度多是恍兮惚兮，模模糊糊。在局势尚不明了之时，在大家都似懂非懂之际，文学恰可以施展其长处，写出这样的状态。

梁生宝是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加林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两个人的不同抉择传递出不同时代的不同信息。路遥写出了当时抉择的方向和人心之所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似乎一直延续到现在，高加林的寿命就附着在80年代以来的信息上，这么多年高加林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时代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着，从未有大的改变。除非有朝一日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生》才会被遗忘，高加林才会死去。

路遥与传统文学

□王 峰

在最需要营养的成长与学习岁月，路遥却遭遇到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的双重匮乏。对食物、知识的饥渴感时时折磨着他。《平凡的世界》开篇孙少平背着人狼吞虎咽地吃菜汤、黑窝头的场面常被人称引，而小说中紧接着便描写了孙少平对课外书的渴求：

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平凡的世界》具有“半自传”性质，这段描写也反映了少年路遥探求知识的心路历程。路遥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更明确谈到：“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即使时过境迁，他的生活条件和学习、写作环境改善之后，这种总担心“吃不饱”、抓住机会就“狼吞虎咽”式阅读的“补偿”心态仍然很明显，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如是说：

如果下午没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

路遥“狼吞虎咽”的书籍，大部分是长篇小说，但他阅读面很宽：

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

这不禁让人想起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那位获救的主人公：他床铺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以防备饥荒的心理进行阅读和写作，这或许可以解释路遥近乎偏执的创作方式，也可以说是推动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构成路遥知识体系的大量“杂书”里，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学读物，再细说，则有古典小说、历史文学和古典诗词。

虽然以写作乡土味儿的小说见长，路遥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趣味却是相当“西化”的。他钟爱俄苏文学，普希金是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朱鸿在《路遥纪念》一文中曾坦言，路遥不是一个追求风雅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气。他不会吟风弄月，也不懂棋琴书画”。不过，路遥固然没有传统文人习气，也没有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说他不会“吟风弄月”，却未免绝对。虽然路遥不曾留下专门谈论古典诗文的文字，但由一些细节还是看得出来，他还是颇受古典诗词影响的。

路遥的创作，始于诗歌。1972年出版的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所编诗集《山丹丹花开》，其中收录了路遥的《车过南京桥》《农村销货员》《塞上柳》等多首诗作。他诗歌的代表作《车过南京桥》明显采用了传统民歌的形式，句式富于变化，押韵也比较讲究。而据其同乡刘凤梅回忆，1972年她上大学时心境不好，路遥曾特意为她写了一阕词：

未听惊蛰雷，却看桃花水，桑雨如雾雾如烟，春光似梦梦似醉。

此情多生劫，问君有几回？月下怀莫留恋，花前泪且收住。

解得其中无限意，人生路上不徘徊。一心随江流，向着海魂飞。

这并不是一首严格按词牌填写的长短句，但无论具体的修辞、意象还是审美意境，却毫无疑问是古典诗词所特有的。其中的“花”“月”“梦”“泪”等用语，很难说不是在“吟风弄月”吧？如果刘凤梅回忆无误，这实在足以改变我们对路遥早期创作皆“革命文学”的印象。

路遥1987年初冬为榆林一些文学社团题词中，写给清涧宽州文学社的题词是：“三边都豪气，芦河有锦情。”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谈创作方法优劣时，有这样一段评论：

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这两句，出自李白的讽刺诗《嘲鲁儒》。在众多的李白名作中，这首诗并不算出名，这两句也并非传世名句，或许只有李白研究专家或特别喜爱李白的读者才可能注意到此诗——而路遥显然不是这种人，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并随手引用这两句诗呢？由他的成长经历，这样的推测或许是合理的：在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正好经历了所谓“儒法斗争”，而李白这首诗，当时是被视为法家批评儒家的作品特别提出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机缘，使路遥牢牢记住了这两句诗。他最初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实由此类“运动”所开启，这在下面还会谈到。也缘此，他的传统文学阅读和知识是零散的、不够系统的。

与古典诗词修养相比，路遥对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阅读要更为系统，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明确的评论意见，尤其是对《红楼梦》甚为推崇。在回答“最喜欢谁的作品”这个问题时，路遥的答案是“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而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更展开地谈到了关于《红楼梦》等古典长篇小说的话题：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3次阅读《红楼梦》，第7次阅读《创业史》。

对《红楼梦》的推崇，与路遥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有关。他主张在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

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在他看来，《红楼梦》显然代表了中国传统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杰出，足以与他喜欢的世界一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等人的作品相媲美，其作者“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而他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则是他乐于接受传统文学熏染的基础。既然“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那么他的“西化”阅读倾向与向传统文学汲取营养也就并行不悖了。

他清楚地谈及，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第三次阅读《红楼梦》。那么，他最早是在什么时候阅读《红楼梦》的呢？他本人并没有谈及。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据他的成长经历作出些推测，他很可能也是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全民评《红楼梦》运动而得到知识普及，开始接触这部名著的。始于1973年的这场全国性评红热潮，其中心意旨是将《红楼梦》定性为一部形象地反映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这场运动同样围绕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最高指示”展开，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这些评论也成为许多人对《红楼梦》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引用到《红楼梦》：“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而《平凡的世界》里也引用了《红楼梦》这句话，应该不是凑巧：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不过，须指出一个细节问题，《红楼梦》里的确多次出现类似的话，却都不是凤姐说的，《平凡的世界》这里所说不确。

路遥接触《水浒传》，很可能同样是由1975—1976年间那场“评《水浒》运动”而开始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第29章中比较明确地述及此事，孙少安出远门回来，他二爸向他传达报纸上的事：

他二爸走到他当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8月31日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少安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哩？”他二爸胸脯一挺，说：“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红楼》《水浒》之外，路遥对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也零散地发表过一些看法。叶广芩回忆，路遥曾跟她谈过《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吕布和貂蝉；《平凡的世界》中也有孙少安打算投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情节。

中国传统观念里，“文史哲”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诗词、小说固然是文学，《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和《庄子》《老子》等哲人之作同样是文学。路遥没有详细谈及他所研读的历史著作，但《史记》应该是他推崇的经典著作。他虽没有专门谈到过《史记》，《平凡的世界》里却特意描写了田福军读《史记》的情节：

进窑后，他在书架上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但又不想读，背抄着手，踱到墙上的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前面。

事实上，这也是小说中惟一写到田福军所读的书。路遥自己讲过，这部小说主要有3条人物主线，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田福军是一个寄托了作者诸多理想色彩的人物，这样一位理想人物，书架上有许多历史书籍，经常翻读《史记》，可见历史著作和《史记》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有意无意地，路遥也继承了《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著书，终于写成皇皇《史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坦承，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只是因为还有未竟的著述事业；他引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人的事迹激励自己，“《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谓“发愤”，指身处逆境而不消沉，反而更加激扬奋发有所作为。也缘此，司马迁对《史记》寄托了极高的期待：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对照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自己创作动机和价值取向的阐述，与司马迁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暗合的：

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甚至两个人选择的具体写作方式都是相近的，司马迁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而路遥则决心“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他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间没明没黑地翻看、记录，“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在《平凡的世界》最终完成的那天，路遥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地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这不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吗？写作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写作完成时的巨大幸福感，也是相似的。在写作道路上，路遥仿佛与2000多年前那位同样生活在陕西的伟大历史作家再度“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丛刊2013年第12期目录

文学史研究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潜对话” …… 潘建伟
《玉梨魂》版权之争与职业作家的形成 …… 胡安定
鲁迅之于余华的“资源”意义 …… 吴小美
“深入生活”：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与创作方式 …… 王本朝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三个“中心主义” …… 刘 俊
重“头”来过：再读海外学界的晚清研究 …… 余夏云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叛徒形象及其相关的文学史问题 …… 郭剑敏

文献史料研究
师陀《雪原》与《学生月刊》 …… 胡 斌
引玉书屋版《从苏联归来》译者考 …… 北 塔
徐志摩名号考 …… 吴禹星 刘子侠

作家与作品
毛泽东诗词再论 …… 吕家乡
论杨炼的诗（13050） …… 陈爱中
“范登高现象”的启示
——论《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的内在矛盾性 …… 余荣虎
“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
——一些连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思绪 …… 张直心
论舒群的小说创作及其历史贡献 …… 郑丽娜
端木蕻良小说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 马宏柏

青年作家研究
70后六作家论 …… 刘 涛
计文君论 …… 孙先科
徐则臣《夜火车》与“70后”的成长叙事 …… 孟庆澍
麦家小说叙事的先锋性 …… 王 迅

书评·综述
评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 …… 王 尧 张 蕾
评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兼及新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 何锡章 王 婷
读陈国恩《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 …… 袁盛勇
“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北京论坛”会议综述 …… 刘春勇 范福林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